

· 中外文化交流 ·

韩国所见《两仪玄览图》

杨 雨 蕾

—

《两仪玄览图》(简称《玄图》)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李应试在北京刊刻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李应试,又名李葆禄(Paolo Li)、李省勿,天主教徒。根据《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如松传》和卷三百二十《朝鲜传》的记载,他在明代曾以参谋(参军)身份随明军入朝鲜抗倭^①。关于《玄图》的刊刻,邹采斯、阮泰元在该图跋文中称:“先生(李应试)向因吴淦曹请刻大地图于留都,幅促而略,李缮部复增其幅而稍详,第已摯之南游,大都多方士闻而未见者,誓惜弗宁。兹刻也,幅愈广,述愈备,……”又,利玛窦在《玄图》跋文中写道:“友人李省勿先生,博奥无两,于霄壤间理学无不究心……今之演刻是图,岂非广造物之功而导斯世识本元之伊始乎? 窦不敢辞,谨参互考订,以副吾友美意。”可见当时李应试因李之藻将其 1602 年所刊刻的六幅本《坤輿万国全图》(简称《坤图》)带离北京,许多士大夫闻而未见,便请求利玛窦再作。于是在经利玛窦“参互考订”之后,这幅比《坤图》稍大的八幅本世界地图刻成,名为《两仪玄览图》,图名当为李应试所定。利玛窦在肇庆曾制作了天球仪和地球仪,“两

仪”指这两种仪器，意为“天地”，“玄览”则取《老子》“心居玄冥之处，览之万物，故谓之玄览”之意^②。

我们知道，利玛窦亲自参与绘制的世界地图刻本据研究共有六部^③，其中现可见的仅有两部，一是1602年北京版《坤图》，二是《玄图》。《坤图》的藏本较多，梵蒂冈图书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意大利波洛尼亚观察大学等处均有收藏，另外，该图还有不少摹绘本传世^④。而《玄图》现知藏本只有两部，均为木刻印本，一部为辽宁省博物馆藏本（简称辽本），一部为韩国崇实大学（原名崇田大学）基督教博物馆藏本（简称崇本）^⑤。关于辽本，王绵厚在《利玛窦和他的〈两仪玄览图〉简论》（载《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1981年）和《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上的序跋题识》（载《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2期）、曹婉如等人在《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中曾作过介绍和一定的研究。至于崇本，国内学者却知之寥寥，如曹婉如等人（《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称崇本现已下落不明；王绵厚《论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上的序跋题识》中称“朝鲜黄氏藏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见其介绍和发表，至今不知尚存否？”曹婉如等人所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更是称辽本《玄图》可能是世传孤本。1999年夏笔者在韩国期间有幸与黄时鉴师到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亲眼见到这部崇本《两仪玄览图》，颇为欣慰。本文介绍崇本《两仪玄览图》，并将该本与辽本作一比对，以飨学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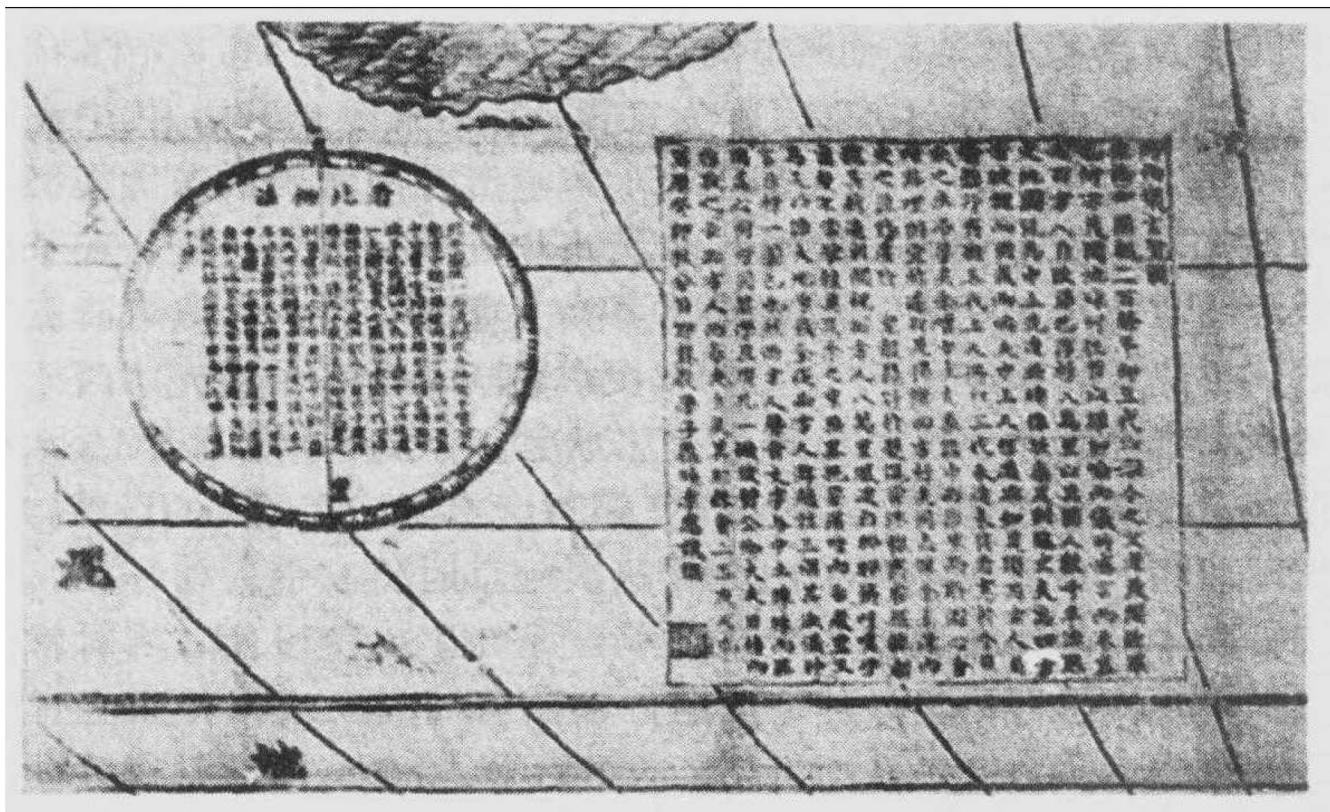
二

《两仪玄览图》于何时传入朝鲜半岛？据韩国金良善的记载，朝鲜王朝时期黄汝一和他的儿子黄东溟在1603年和1604年两次作为使臣来到北京，《两仪玄览图》为黄东溟1604年赴京回国时

带人^⑥。韩国李光麟对此查阅《蔚珍黄氏族谱》和《国朝榜目》后指出，黄东溟的儿子为黄中允，东溟为黄汝一的号，因此黄汝一的儿子应为黄中允。他还说，根据《宣祖实录》和《光海君日记》的记载，黄汝一赴京时间为宣祖三十一年（1598），黄中允赴京时间则在光海君十二年（1620）^⑦。笔者查阅《东溟先生文集》，发现黄东溟确系黄汝一之子，东溟并非黄汝一的号，而是其子黄中允的号。至于两人的赴京时间，除《宣祖实录》和《光海君日记》的记载，李廷龟（号月沙）《戊戌朝天录》和黄中允《西征日记》也称述黄汝一于1598年作为书状官入京，黄中允则于1620年作为正使入京。查阅《西征日记》虽并无有关《玄图》的记载，但我们以为，最有可能是黄中允在这次赴京时将它带入朝鲜的。

崇本《两仪玄览图》最早为学界所知是在1936年。当时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朝鲜学生黄炳仁在回国期间发现祖传家宝竟是一幅题为《两仪玄览图》的地图。据黄炳仁介绍，他当时在日本读书，知道家中有祖传之物，父母曾说若打开它就会得重病。黄炳仁相信父母的话，原来一直没有想到打开来看。那年，他暑假回家，想知道祖传的到底为何物，于是不顾家训将它打开，所看到的就是这幅世界地图。于是黄将它带到日本，示于其师石田干之助及其弟子鲇泽信太郎，当时在场的另一名学者中村拓摄下照片^⑧。1936年，鲇泽信太郎在日本《历史教育》十一卷七期发表该图介绍性文章《关于利玛窦的〈两仪玄览图〉》，之后又在论著《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利玛窦世界地图》（1941）、《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历史研究》（1953）和《地理学史研究》^⑨（1957）中发表他对此图进行的研究，并在《地理学史研究》中附印了此图的照片。1961年，德礼贤（Pasquale M. D'Elia）在《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最新发现及其研究（1938—1960）》（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Monumenta Serica* 20, pp. 82—164）一文中根据鲇泽信太郎所提供的照片，将该图与《坤

图》进行比较，尤其特别整理了《玄图》上新见的序跋题识文字，并将它们译成英文。崇本《两仪玄览图》因此为学界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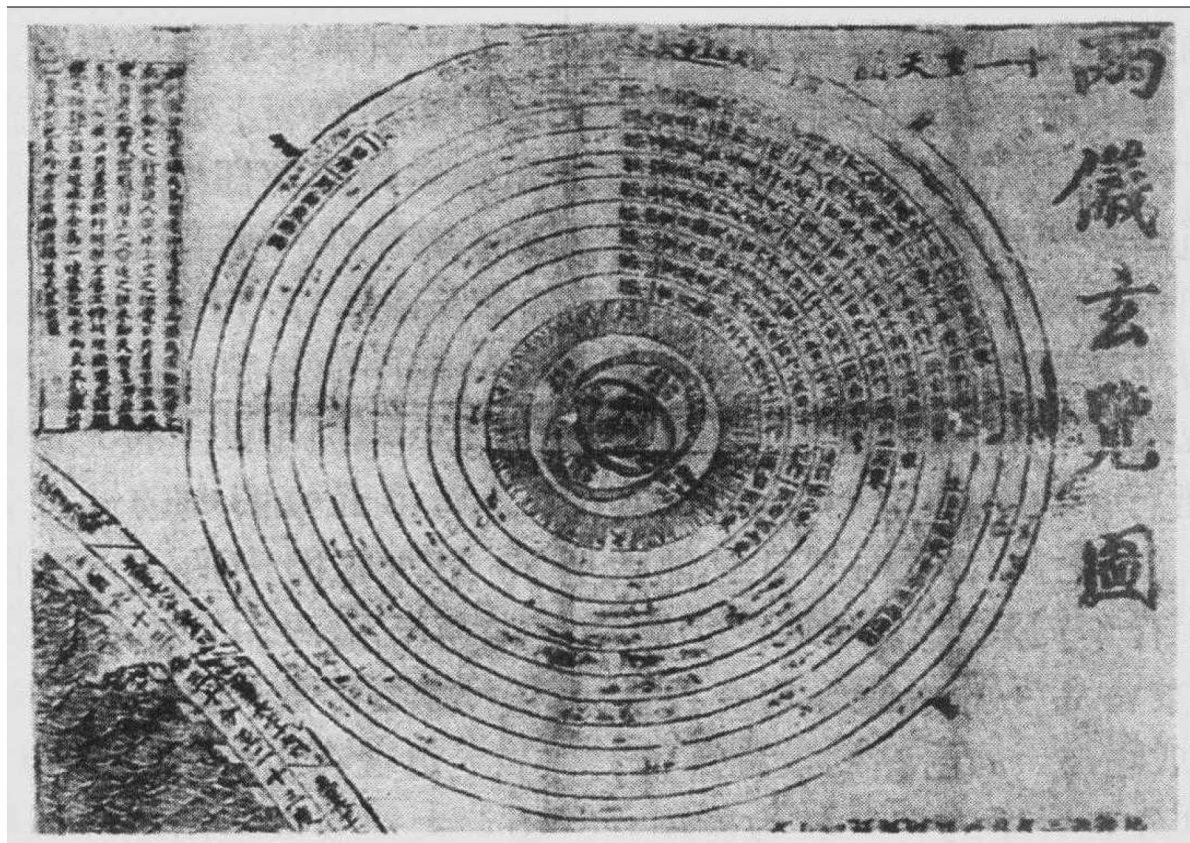
之后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创办人金良善在 1945 年韩国脱离日帝统治后承黄炳仁的好意一直将此图收藏于其博物馆中。据金良善记载：朝鲜战争时，博物馆的数千件珍品向南方转移。他由于舍不得这部独一无二的《两仪玄览图》和安重根义士的《狱中遗笔》，便亲自带着它们渡过汉江。然而当时飞机在头上盘旋投弹，生命都岌岌可危，还如何保存这一世界珍宝？于是便又冒着弹雨回到博物馆，将它们埋放于此。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此地，发现埋放在博物馆的物品有部分因进水而未能保存下来。所幸博物馆的全部藏品未被烧毁而得以大部分保存下来，而最为令人高兴的是此珍品未受损害^⑩。

笔者在韩国见到这部保存十分完好的《两仪玄览图》时，深感一件历史珍品得以传世实属不易，不禁对那些历经艰辛的保存者们倍加崇敬。

三

崇本《两仪玄览图》八幅合一，全图纵长 199 厘米，通横宽 444 厘米。我们知道，辽本《两仪玄览图》为纸地版刻墨印本，是 1949 年从沈阳故宫翔凤阁的屏风上揭下来的，图已有些破损，经修补装裱成八幅挂屏。据报道，该图每幅纵 200 厘米，宽 55 厘米，通宽约 442 厘米。由此可见崇本与辽本两者大小基本相同。然而崇本保存较为完好，几乎未有毁损；而辽本据笔者所见的图版^①，八幅图中的每幅左右两侧则均有不同程序的缺失，此外，全图底部缺失窄窄的一条，上部也有部分缺失。因此，辽本的大小尺寸似乎并不是完全根据现存的大小测量的。笔者看到的仅是缩小的图版，未看到原图，对这一点还不能确定。

崇本《两仪玄览图》在韩国崇实大学博物馆 1988 年刊印的《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图录中有缩印图版。我们根据所见原图，并将该图版与辽本图版进行细校，认为两本当为同一刻版



印成，但也有不尽相同之处。首先，辽本在山脉上添有十分醒目的青绿色，而且，辽本与崇本山脉上的线条明显不同，这或与着色有关。其次，辽本在一些汉字旁加有墨书满文注音，其内容主要包括：①大的海洋名称，如大东洋、北海、大明海、小西洋、地中海等；②洲名，如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南亚墨利加、北亚墨利加等；③一些线的名称，如赤道昼夜平线、短线、昼长线、地南极界、地北极界等；④图名，如赤道北地半球之图（至于赤道南地半球之图的图名也当标有满文，但因毁损在图中已不可见）；⑤部分亚洲国名，如日本、朝鲜、吕宋等；⑥北京、沈阳等地名；⑦第三幅图赤道线下一段说明赤道线的文字。第三，崇本在朝鲜半岛处用朱笔加有“朝鲜”两字。对于前两点，当如王绵厚等人所说，“此系明末清初流入清宫内府后，为供清帝浏览时所添。”^[9]至于第三点，当为图本传入朝鲜半岛后所添写。

崇本保存较为完好，比辽本更为清晰、完整。前已述及，辽本八屏幅图中的每屏幅左右上下均有缺失，不仅如此，其每幅图还均有不同程序的漫漶。与崇本相比对，其缺失和漫漶的内容包括：①标题，出现在第一幅图右上角的标题“两仪玄览图”，其中“览”字已漫漶不见；②序跋题识，出现在第四幅图中的“钟伯相常胤绪序”几乎完全残缺，此外，第一幅图中“利玛窦序”、第四幅图中“冯应京序”和“邹采斯、阮泰元跋”、第五幅图中“利玛窦为李应试刻‘玄图’序”等均有不同程序的残缺；③说明，如出现在第一幅图中的“九重天说明”、第八幅图中的“周天黄赤二道错行中气界限说明”均完全不见，而第五幅图中的“看北极法”、第七幅图中的“日月蚀说明”、第八幅图中的“天仪图说明”有不同程度的残缺；④附注，如第五幅图中“东夜国”和“大茶苔岛”的附注等均有残缺，第六幅图中的“苏门答勒”和“大爪哇岛”的附注的模糊不清；⑤表，出现在第三幅图中的“横度里分表”不完整且较为模糊；⑥图，大椭圆形地图之外的“赤

道南地半球之图”、“赤道北地半球之图”、“日月蚀图”、“周天黄赤二道错行中气界限图”等均有残失模糊之处，尤其是“赤道南地半球之图”仅存轮廓；⑦一些岛屿地名，如第一幅图中“鹤岛”、“怕雾打岛”、“河摺诺沧”等岛名不见，又如第二幅图中的“帕齐那国”、“巴岛的”、“金鱼湖”、“皮克蜡”等地名也模糊不清。

总之，辽本缺失模糊不清的较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崇本能补辽本不足。然而也有少数的地名、岛名及一些附注等辽本能补崇本的不足，如第二幅图中“古巴岛”下方的“如汉岛”、“亚作你西以小”等和赤道线以上的“祈多”以及“南北亚墨利加”和“墨瓦蜡泥加”的附注，崇本模糊不清，而辽本则较为清晰；再如崇本第三幅图中在墨西哥湾右现加利福尼亚半岛处有一小角缺失，而辽本则较为清晰，并标有“十字湾尾”的字样。由此可见，若要进一步对《两仪玄览图》进行研究，需两本相互参照利用，而由于崇本的可依据性较强，看不到崇本就难以做好相关的研究。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是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的重大成果，对它的研究需要各国学者共同努力，并在学术交流的基础上不断深入。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且不断出现新的成果，然而国际学术交流却不尽如人意。就笔者所知学界对《两仪玄览图》了解的情况，国内学者不清楚传入朝鲜半岛的《两仪玄览图》现被收藏在韩国崇实大学，同样国外学者对辽宁博物馆藏本也知之甚少，这种情况势必会影响对此图继续深入研究。学术信息和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注：

①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上册，页156—161；《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下册，页491—492。

②参见曹婉如等：《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载《文物》，1983年第12期，页63。

③这六部包括 1584 年肇庆王泮刻版《山海輿地图》，1596 年南昌版《輿地山海全图》，1600 年南京吴中明刻版《山海輿地全图》，1601 年冯应京刻版《輿地全图》，1602 年北京版《坤輿万国全图》（包括李之藻刻版和某刻工刻版两种），1603 年李应试刻版《两仪玄览图》。

④参见 Day, John D.,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Vol. 47, 1995, pp. 94—117.

⑤Debergh, Minako 在 “La carte du monde de P. Matteo Ricci (1602) et sa version coréenne (1708) conservée à Osak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274 (1986), pp. 417—454] 中称，韩国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部《两仪玄览图》，但根据 Day, John D. 的调查，韩国中央图书馆和汉城大学奎章阁均未藏有该图。参见前揭 Day, John D. 文。另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韩国现还未发现有第二部《两仪玄览图》藏本。

⑥⑧⑩参见（韩）金良善：《明末清初耶稣会宣教师制作的世界地图》，载《梅山国学散稿》，韩国崇田大学校博物馆，1972 年，页 186—189。

⑦参见韩国李光麟在“纪念利玛窦入东亚传教四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1983 年，汉城）上对日本矢泽利彦（Yazawa Toshihiko）“Fr. Matteo Ricci’s world map and its influence on East Aisa” 一文的讨论文。载《东亚研究》，第 3 辑，韩国西江大学东亚研究所，1983 年，页 203。

⑨其中研究《两仪玄览图》的有关部分被译成中文发表在《科学史译丛》1983 年第 3 期，名为《关于利玛窦的两仪玄览图》。

⑪⑫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图 58、59 及说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